

流年碎影

——毕业20年光阴的记忆

□ 吴谨（物理系物32班）

年轻是一辆承载风景的街车
青春就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的
你的心还在远方流浪吗
让老朋友的一声问候
唤醒你心中所有美好的回忆

这是年少时的一位朋友从美国寄来的明信片上的一段话，不知道作者是谁，我读来感觉如同沐浴在和煦的春风中，宛若美国电影《毕业生》中那首著名的插曲《斯卡堡小镇》，听后至今还在心中萦绕。岁月如梭，1983年入学的日子还可清晰忆起，1988年毕业后的时光却已经流逝了二十年。二十年，一段

曾经以为很漫长的时间，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匆匆溜走了；二十年，我们走过了青春，进入了中年！蓦然回首，当年班上的二十六个成员，如今已散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湮没在如蚁的芸芸众生中。

记得填报高考志愿时，在北大和清华之间我选择了以工科为主的清华大学（当时不知道物理系也属理科）。这个消息传出时，我的化学课老师大为惊讶，对别人说，清华大学录取的都是高官或教授的子女，我一个贫苦农家子弟，岂不是不自量力？好在与化学课老师平素交往很少，他的话传到我的耳朵

里，也没有太在意；另外家徒四壁，填报完志愿后就很快回家干农活了。当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达我手上时，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激动，仿佛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读着录取通知书上校学生会给新生的信，心中还是对北京、对清华还是有很多的想象和向往。也许是多年的教育缺失，也许是贫穷，也许是年少不更事，也许是其它，在离家赴京的前夕，我没有去学校拜会老师，以感谢他们的多年教育之恩。在伯父的陪伴下，求得了时任县教育局局长不耐烦的签字同意，领取了县教育局50元人民币的奖励。在

鬼，按在床上臭揍一顿，为此我们爆笑很久。后来我们实在忍不住投案自首，老师没有生气，还宽容地给了一句：“我一猜就是你们俩干的好事”。直到现在，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常常会想起这件事，心里倘佯的是对老师的敬爱、甚至是对愚人节的好感。

那时候我们还很孩子气，老师管得多了背地里嘀咕嘀咕，老师学业忙疏于管我们，我们就会做点小动作引起老师注意。真希望老师能从我们的顽皮中了解我们的善意，我们的认同，我们的尊敬。

王老师很优秀，被国家计委钦点，我们失落地传递着老师要走的消息，还不忘调侃那是“计”划生育“委”员会。两年多来，同学们把王老师当作我们班的一员，沈龙华更是和王老师无话不谈。老师说走就走，我们很不适应。但是没有办法，没有留王老师的理由，只能祝福他在工作岗位一路顺利。

续任班主任黄炜刚是一位老教师，听说下放过，伤了腰，身体不好。他把我们当大人，让我们自主管理。但我们班淘气的男生们没少给黄老师找麻烦，有一次节日会餐，男生居然从四楼把酒瓶扔到了五楼室内，弄坏了楼上兄弟的眼镜，楼上的兄弟对修眼镜极为不满，希望能换一副新的。有又一次在课间教室大转移时，人多路窄，男生无意碰到了校工沈老师的车把，挤伤了老师的一个手指，为此沈老师反映激烈，一定不能仅仅抱歉解决问题，要有经济补偿。为了处理这些棘手的事情，黄老师总是艰难地一趟一趟上下一号楼。

后来我们被分到了各个老师那里做毕业设计，我们的集体活动少了，我们自主地维持着班级的运转，甚至选出了最后一任班长——劳康福。我一直觉得这次选举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因为劳班长虽然随和超脱，但不是一个喜欢张罗的

人，而且当时临近毕业，各种事情很多，班长不好当。记得劳康福走到讲台前，捏一捏手里的手套：“既然大家信任，就试试吧。”我们激动地使劲鼓掌。

我们女生很乖，两年时间几乎不认识黄老师，直到最后分配动员时，才和黄老师有一些接触。黄老师很辛苦，把要人单位的情况一条条帮我们分析，根据每个同学不同的情况提建议。

有一天在高压室做实验，有一位老师来面试，后来我被分到的电工所，在分来之前我不知道清华南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单位。后来听说是黄老师建议的，说专业对口，离家又近。我在电工所一干就是20年，自得其乐，应该感谢黄老师对我的指导。

我感到幸运，为我们班有两位这么好的班主任。👍

不知道到北京需要多长时间的情况下，我便离开县城，踏上了通往北京的路。由于经济不允许，伯父陪我到湖南怀化后，便给我买了张站票，让我独自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车到湖南湘潭，一位善良热情的大姐给我买了一支雪糕并为我找了一个座位；车到河北保定，一位好心的大哥知道我一个人到北京上学，带我下火车，并送我到火车站旁边的旅馆介绍处，嘱咐我怎么找旅馆后才离开。那是1983年9月4日晚上8时左右，而清华到9月5日才有校车到火车站接站。在黑夜中，我登上了9路公共汽车，在团结湖水碓子找到一个地下旅店住下。次日，我从旅馆走向回北京站，找到了校车，开始了在清华大学的生活。

二十多年过去，现在也不明白，当时从来没有离开过县城（其实那时是一个小镇，两条街道，没有公共汽车），没见过也没坐过城市公共汽车，更不知道有北京市交通图的我，当年是如何在黑夜中独自找到那家小旅馆，并在第二天又步行回到北京站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忘了那支雪糕的味道，也不记得热心的大哥、大姐的模样，但是他们的关心，我却一直铭记。如今，他们都该到退休年龄了吧，祝愿他们平安健康幸福。二十多年过去，那位县教育局官员对人的态度也一直遗存在我的记忆中，我时时提醒自己，要尊重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人与人之间可以岗位不同，可以职业有差别，但是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

入学时，我分在物32班，与来自江西吉安的薛平（现居北京）、北京八中的付兵（现居加拿大）、江苏如东的施建光（现居北京）、四川乐至的周文胜（现居新加坡）、浙江定海的章建定（现居新西兰）等六人住16号楼308宿舍，班

主任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美丽女老师（高虹，现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一天晚上，在313宿舍，大家作自我介绍时，我才发现张卫东（现居美国）有那么高个；也才发现，班上26人中，来自达官显贵家庭的人很少很少。现在想来，当我们这些处于边远山区的懵懂少年还在坚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候，大都市的孩子们已



经先行知晓了世界，有了更多的选择。所以，我们308宿舍熄灯夜谈时，我发现付兵的知识是那么的丰富、言谈是那么的富有逻辑，而自己几乎什么也说不出，基本只有听的份。

一时的嘴拙并没有妨碍我对大学美好生活的想象。王德保（现居北京）曾对我说，当他第一天躺在315宿舍的硬板床上时，心中有难以抑制的激动。我虽然没有德保那样的心跳感觉，但是，当章建定带着我穿越开满鲜花的小路去照澜院商店购买日用品时，我觉得仿佛到了梦中的花园。自己在这里将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呢？那时年轻的我记得，应该做一个“全能型”的人，科学、文学、艺术、体育等诸方面都有所擅长，站能滔滔不绝，坐可侃侃而谈。为鼓吹自己的观点，在我们物32班负责的黑板报上，我还写了一篇短文，标题叫“做一个全能型的人”。对于这个观点，当时我们的系主任张礼教授（理论物

理学家，现在还活跃在学术界，口才极好），在某次全系大会上还作了点评，认为不可能做到“全能型”。——现在，二十多年过去，我已经懂得并认可张礼教授的评述，不过，年轻的时候，就像雄鹰一样，谁不希望自己拥有最好的翅膀，飞得最高，飞得最远呢？

也许是中学档案中对我有很多言过其实的记载，一入学，我们美丽的班主任便安排我担任团支部书记（薛平任班长）。其实，我中学时不过只知道死读书罢了。在中学时，挂着这些头衔，并不需要做任何工作，所以根本不具有能力在大学时领导“全国人民”，当时班上26个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其中包括当年湖南高考理科状元陈光培（现居美国）。后来，我们美丽的班主任出国留学，换了妈妈班主任杨立明老师（现居北京，已退休），我便主动辞掉了这个位置。我的这个“退却”动作，并没有打击当时的辅导员唐华老师（现在好像也居美国）对我的信心，他曾多次单独找我谈话，对我各方面非常关心。

大学期间，印象深刻的人还有一个是当时的校团委书记林炎志老师。我和林老师没太打过交道，但毕业多年，我仍很关注林老师的消息，他后来当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去了吉林后，我就不太有他的信息了。林炎志老师做团委书记时，清晨去食堂帮厨。在九食堂，林老师就曾给我盛过稀粥；也曾为我们上过团课，内容诚恳实在。二十多年过去，唯愿林老师一切都好。

大学的学习，我基本上没有对哪一门功课特别感兴趣，没有哪一门功课学得特别好，特别透，处在云里雾里中。当张三慧教授用英语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时，我似懂非懂；当张三慧教授推荐我们阅读费

曼的普通物理讲义时，我也从图书馆借过，看同宿舍的付兵读得津津有味，我却丝毫没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后来参加CUSPEA考试培训，秦明华老师用英语给我们讲天体物理脉冲星，我更是如坠云雾，根本不知所云，这时，我又一次选择了退出（因此没有参加该门功课的期末考试，总评成绩得29分）；当陆七一同学（现居澳大利亚）感叹徐湛教授的电动力学讲得真透彻明白时，我也没有同感。更为出格的是，学习微机原理与应用这门课时，我甚至还跑到科学馆，向任课老师信箱里投入一张署名纸条，上面写着：“老师，你的课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啊？”还好，老师可能没有看到那张字条，没有任何答复，当然更没有怪罪我。那时，也许是功课众多，思考时间有限，加之年轻脸皮薄，身体差（严重神经衰弱），那么多不懂都放过去了，没有进行任何课堂发问；不像现在，年龄大了，脸皮厚了，时间多了，有点思考了，发现问题，敢于及时发问了。幸运的是，即使如此，除机械制图课外，我其它功课的考试成绩都能够顺利过关。

也有我感觉不一样的老师。记得夏学江教授曾经代了几节CUSPEA课，他将一些物理概念阐述的非常清楚，例如，他告诉我们用我们学过的物理知识可以估计一些的日常生活现象，如，人最高可以弹跳多高，等等；他还对物理公式两边必须量纲一致感兴趣，并据此教授我们量纲分析法。李师群教授的课也讲得好，好到使我觉得李老师肚里还有好多知识——满腹经纶。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郝柏林院士关于分形分维的讲座也非常有趣，给我们展示了用分形理论生成的美丽图案，并且还告诫我们“如果神经衰弱，睡不好觉，就千万不要研究理论物理”。讲座时，郝院士还是满头浓密黑发，前不久，见到他时尽管雄风犹在，但已满头银发了。真是岁月催人老！

为了做一个“全能型”的人，我还选修了一些文科课程。二十多年过去，几乎对这些课程没有什么印象了。记得有一个讲座，十食堂门口的广告牌上黄纸红字醒目地写着标题《心灵的荒漠》，好像是谈爱情的，在文科楼进行。被耸动的题目所吸引，去了好多人，走廊都站满了，不过开始不到二十分钟，就只剩下包括我在内的二十几个人了。我也没有坚持到最后，在众目睽睽下，拎起书包提前退场。也还记得，毕业时，为了考研究生，在主楼后厅，听政治课教授给我们复习政治。如“子曰诗云”一般，教授在讲台上谆谆教诲，为什么“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的，为什么不适合中国国情。当时老师在台上反复强调，我因此背得清楚，考试轻松过关。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我已人到中年，当有人在台上滔滔不绝时，我就想起尼采的那句名言“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当年那位给我们论述“三权分立”的教授应该已经退休，不知道是否还坚持当年的观点，自考试完成后，岁月就将您灌输给我的这类知识慢慢地消磨掉了。

就这样，我结束了五年的大学时光，收获了丰富的友谊，遗憾的是没有爱情。毕业时，可能因为还继续留在北京，所以没有感到深深的分别的痛。只记得那天在清华大学南门口送刘连峰（现居扬州）上公共汽车的时候，我头脑有过一阵茫然，依存五年的集体不存在了，感觉到些许的空虚孤独。

毕业后的日子是心灵流浪的孤独日子，后来我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进行专业课学习。1993年12月，我报考了清华大学电子系的博士研究生。由于前夜睡眠不好，考完后我头痛欲裂，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但电子系还是给了我面试机会。尽管后来由于个人原因，我放弃了回到清华攻读博士；但是，我还是要衷心感谢周炳琨院士、高以智教授和廖延标教授，感谢母校和

电子系，感谢他们相信自己的毕业生，愿意给予他一个继续深造的机会！

在此后如水流逝的日子里，即便是每年四月最后一个周末的校庆，我也很少回到清华去。虽然没有任何恶行贬损过母校的名誉，却也没有任何善行以荣耀她的声名。好在我曾经的班集体——物32班，一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每年，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几个同学，都会有几次相聚；另外，只要有京外工作的同学来到北京，我们都会电话召集聚一聚。二十年，从没有间断过。这其中，在清华工作的薛平（现任职清华物理系）和胡永清（现任职清华出版社）起了核心和组织者的作用；企业老总吴晓光（现居北京），无论多么繁忙，只要在北京，电话打到，都会驱车前来。毕业二十年，吃过多少顿饭，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每次相聚，我都会感受到融融的乐趣。在这洋溢的情谊中，时间就流逝了二十年！

由此我想起在国外谋生的同学，加拿大的付兵和黄佳昌，美国的张卫东、邵岩、陈光陪、牛文华、于景华和刘今涛，新加坡的刘通和周文胜，澳大利亚的陆七一，新西兰的章建定，你们不能分享我们年年相聚的快乐，但衷心祝愿你们一切都好！二十多年过去，我们都经历了丰富的人生。时光流转，我们从被人养，变成了要养人；我们从被灌输，变成了能思考；我们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二十多年的生活，一切都写在我们脸上的皱纹里，一切都印在我们已经不再清澈的瞳仁中。

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走过了毕业后的二十年。但不论我们在哪里生活，其实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梦想！我们一路走过了青春，希望我流年的回忆和呼吁，能够像老朋友地一声问候，唤醒你心中所有美好的记忆，并能够鼓舞你继续向前！